



红山文明化进程中的文化碰撞与族群融合*

张星德 卢治萍

摘要:文化因素的融合反映考古学文化背后人群的性质和交往形式千差万别。已知考古资料研究成果都指向距今6500—5700年间西拉木伦河两岸的红山文化是赵宝沟文化的后裔和后冈一期文化移民碰撞并相互融合的产物,并在此期间逐渐实现了从物质文化层面以“三石”“三陶”为代表的显性符号或标志的逐渐趋同,发展到以玉文化、龙信仰和女神崇拜等为代表的信仰与宗教形式的认同。从彩陶观察,仰韶系统的半坡及其后裔也应当是红山文明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最终在新的族群进一步融入辽西时,红山文化不同族群的居民才得以有能力选择认同优先,在各不相属的血缘组织之上,建立起了协调、管理不同族群的公权力,形成了古国文明。

关键词:红山文化;文明化进程;文化碰撞;族群融合

中图分类号:K8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4-0015-10

2023年12月9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发布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研究成果。成果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加速阶段,距今5800—3800年为古国时代,其又可细分为三个小阶段。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自此,以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为起点的晚期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最早的古国文明的典范地位得到了权威认证^①。然而即便如此,红山文化的早期国家性质仍有进一步加以诠释的必要,毕竟时至今日,红山文化既缺少青铜器、文字、城市等传统文明的三大标志性要素,也尚未发现与“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中国方案中的中心聚落(即都邑)和发达的农业相对应的证据。那么何以认为其已经进入了古国阶段呢?在文明起源前夜,中国各地古文化如“满天星斗”般发展的态势下,是什么让居于辽西地区、物质文化发展水平并不比同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先进、甚至还落后于后者的红山文化能够独领风骚,率先进入文明社会呢?

一、文化因素分析与文化碰撞融合

文化因素分析是考古学文化研究中通过比对和统计等手段,区分不同来源的文化因素,识别文化属性及其变化,实现文化内部构成的解构与重组,并构建出动态的文化交流模型。

收稿日期:2025-01-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综合研究”(23VLS006)、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数字考古视域下中华文明起源的红山模式”(L22ZD002)、内蒙古红山文化研究基地2024年度重点项目“比较视域下的辽西史前文化格局与红山文明”(HSWHYJJD202403)。

作者简介:张星德,女,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沈阳 110136),主要从事先秦考古与历史研究。卢治萍,女,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辽宁大学历史学部博士研究生(辽宁沈阳 110136),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考古研究。

红山文化自距今 6500 年左右形成,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历程,大约在红山文化第三期,即距今 5800 年左右开启了古国文明的篇章。其来自不同谱系的文化因素在红山文化分布区所在的辽西地区不断碰撞与交融,该地区的文化面貌始终表现出一种多元的态势,并不断推动着红山文化发生鲜明的阶段性演进,体现了文化碰撞与融合在红山文化文明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突出意义。

属于红山文化第一期的典型遗迹单位主要见于朝阳小东山^②、敖汉魏家窝铺^③、赤峰元宝山^④、赤峰西水泉^⑤、林西白音长汗^⑥等遗址,陶器是由夹砂“之”字纹筒形罐、斜口罐和泥质陶、彩陶共同组成的(图 1)。其中辽西地区前红山文化中没有发达的泥质陶传统,而一期红山文化泥质陶中多红顶器,绝大多数素面,少量施彩,有一定数量红彩,彩陶纹样多为平行竖线、平行斜线、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纹等图案,器物组合包括钵、盆、瓮、壶等,以钵、盆类占多数,与燕南的后冈一期文化泥质陶特征几乎完全一致。同时夹砂陶的主体,从器形到纹饰又主要是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传统的延续,夹砂陶釜在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中不见,却是后冈一期文化夹砂陶中的代表性器形之一^⑦。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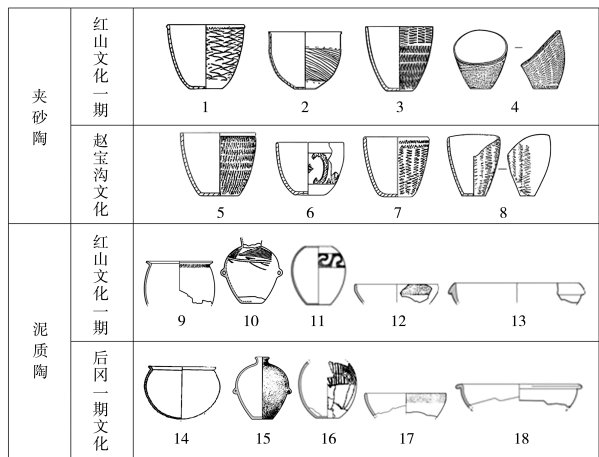


图 1 红山文化第一期陶器文化因素分析

注:1.西水泉 H18:20 2.小东山 F2:10 3.小东山 F2:9 4.西水泉 F17:37 5.小山 F2②:47 6.小山 F1①:60 7.小山 F2①:18 8.水泉 F9②:8 9.西水泉 F17:13 10.西水泉 H2:21 11.小东山 F5:6 12.小东山 F7① 13.小东山 F7①:24 14.南杨庄 T56③:3 15.四十里坡 H8:4 16.南杨庄 T1 17.镇江营 FZH1390:50 18.石北口 H20:29

红山文化是辽西土著文化与黄河下游后冈一期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

属于红山文化第二期的典型遗迹单位主要见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 Z4 下层、第五地点下中层、第十六地点下层^⑧,巴林左旗二道梁^⑨等遗址,陶器器物群组合包括平底筒形罐、斜颈罐、斜口器、瓮、无底筒形器、塔形器、钵、盆、双腹盘、器座等,彩陶基本采用黑彩(图 2)。这个器物群从文化因素上看有三个重要特征。

其一,陶器表现出某些对第一期红山文化因素的继承,比如,泥质陶的红顶钵、叠唇钵以及施于钵类器物口沿的交错平行线组成的带状纹、疏朗的线段或所谓蝌蚪纹组成的带状纹彩陶纹样等尽管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但依然存在,只是高领方体陶壶和陶釜已消失。施“之”字纹的夹砂陶筒形罐、斜口器仍是主体器形。起自红山文化创始之时的主体器物群还在延续。

其二,出现了一批一期不见的新器形或彩陶纹饰,如深腹盆、小口鼓腹瓮、器座和分叉纹彩陶等。经比对可知,小口鼓腹瓮、深腹盆的来源是岱海地区的鲁家坡一期文化,而器座以及由几何化或散化鱼纹演化而来的各类分叉形纹和长尾三角纹等彩陶纹样的因素,应来自黄河中游半坡文化。

其三,该期晚段出现了在外来因素基础上本地创新的新器形和彩陶纹样,如无底筒形器、塔形器。彩陶纹样开始出现卡勾纹、正反双卷组成的涡纹等。且后者逐渐加入了红山文化陶器群的主体成员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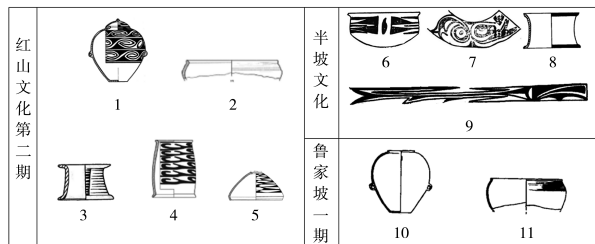


图 2 红山文化第二期陶器文化因素分析

注:1.牛河梁 N2Z4M5:1 2.牛河梁 N16T1108④:14 3.二道梁 T29①:1 4.牛河梁 N16-79T3③:5 5.牛河梁 N2Z4M4:W57 6.姜寨 ZHT28M306:5 7.姜寨 ZHT5M76:8 8.大地湾 T307:25 9.大地湾 M218:2 10.鲁家坡 H6:5 11.鲁家坡 H19:4

红山文化第三期,以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遗存为代表^⑩。以牛河梁女神庙的出现为代表

的红山古国形成之时的陶器组合主要包括筒形罐、浅腹钵、折沿圜底钵、内唇加厚的钵、盆、小口瓮、有领罐、大口罐、折沿浅腹罐、大口瓮、熏炉盖、筒形器、塔形器等。在这个器物群中继续保留夹砂“之”字纹筒形罐和斜口器等传统器形,具体造型与纹饰构图有所变化,泥质陶中已不见一、二期较多的叠唇钵、折腹钵等。显然此时红山文化陶器中源自后冈一期文化的因素继续淡化,与此同时,仰韶文化系统的半坡文化和西阴文化因素在器物群中共出,前者有小口长体瓮、折沿浅腹罐、大口罐、折沿圜底钵和对角直角三角形彩陶纹样等,后者有大口瓮等(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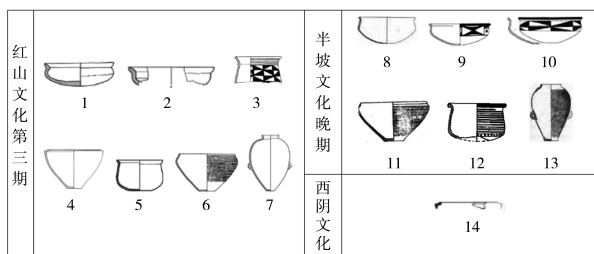


图3 红山文化第三期陶器文化因素分析

注:1.牛河梁 N1J1A:18 2.牛河梁 N1H1:12 3.牛河梁 N1J3:10 4.牛河梁 N1J2(《报告》图三十一) 5.牛河梁 N2Z4H1:7 6.牛河梁 N1H3:2 7.牛河梁 N1H3:1 8.半坡报告图九〇·4 9.原子头 H100:3 10.东庄村 H104:11 11.姜寨 T66W90:1 12.原子头 F3:6 13.半坡报告图一〇六·3

从上文分析可知,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兴隆洼-赵宝沟系统文化与后冈一期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其后又在后冈文化早期与进入内蒙古中南部的移民文化——鲁家坡文化和仰韶系统的半坡文化及西阴文化持续多批次碰撞交流与融合中,最终形成了古国文明。

多种文化因素共生,是文化创造者的行为的结果,多元文化因素反映的文化融合原因众多,文化融合与人群融合是不同范畴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可能是A人群吸收了B人群的文化,也可能反之,其原因可能是战争、交换、通婚等,也可能A、B两个人群融为一体带来了文化因素的全面融合。研究由不同文化因素构成的考古学文化背后的人群主体、性质、各文化因素的形成过程,对认识红山古国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文化因素分析基础上的族群研究非常必要。

二、文化融合与族群融合

(一)西拉木伦河南北文化传统的差异与红山人中的后冈族群

如何理解红山文化中的后冈一期文化因素与辽西土著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呢?根据文化因素分析,红山文化形成之时的陶器包含了两个主要来源:其一是夹砂筒形罐、斜口器和“之”字纹类,主要来源于当地赵宝沟文化;其二是泥质陶及陶釜、器盖等器形,主要来源于后冈一期文化。由此,后冈期红山文化所属族群的性质就出现了三种可能性:一是后冈一期文化居民接受赵宝沟文化因素的影响发展而成;二是赵宝沟文化居民接受后冈一期文化因素的影响发展而成;三是赵宝沟文化与后冈一期文化碰撞后二者融合形成的新族群。因为目前不具备通过人骨DNA检测了解人群血缘归属的条件,所以仍必须从对红山文化相关遗存的分析研究来获得答案。

在红山文化一、二期近千年的时间内,始终存在着基本以西拉木伦河为界在遗迹、遗物等方面都分别延续着辽西古老的兴隆洼-赵宝沟文化系统和燕南后冈一期文化系统两大文化传统的地域性文化类型。

首先,陶器方面。西拉木伦河南北两大区域,在泥质陶比例、器类丰富程度、彩陶数量多寡等方面都有差异,即便是同类器,在具体形制和纹饰的风格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最为清晰的是西拉木伦河南北长期稳定的制陶工艺上的差别。

西拉木伦河以北的红山文化包括泥质陶在内所有陶器皆采用泥圈套接法成型,罐类的平底采用底包帮或帮包底方式制作而成。泥质陶比例小,器类也相对较少,以筒形罐、斜口器、钵和瓮为主,缺乏釜、壶、盆类器物;筒形罐多直口微敛;器物表面的“之”字纹施纹结构松散,划纹多见成组短划纹或由数条成组长划纹组成,彩陶较少。西拉木伦河以南的红山文化陶器以泥条盘筑法成型,即便是被认为来源于土著赵宝沟文化的筒形罐,与西拉木伦河以北的红山文化在陶器制法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用泥

条盘筑法做出圜底器的基础上,在底部外周贴泥带,再在其下贴圆泥饼形成平外底。泥质陶占有较大比例,陶器器类丰富;筒形罐多直口略敞;“之”字纹排列较紧密;划纹多为由细密成组的交错长划纹组成的三角纹;彩陶较多。来源于后冈一期文化的器型的历时性演变在红山文化形成后,也均与燕南的后冈一期文化具有同步性^⑩。

器物的外观,包括器形和纹饰等元素,在考古学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因其外向、直观且容易相互影响而被对方吸收并使其文化面貌发生变化;内含在器物中的技术信息,包括工艺及工艺流程等由于需要传承和学习,则会显得较为私密、保守,并成为文化因素中更加不易变化的成分。这两种工艺分别是后冈一期文化系统和辽西土著的兴隆洼-赵宝沟文化系统根深蒂固的传统。从分期的角度看,这种工艺上的差异稳定地存在于红山文化的一、二两期,持续了近千年之久。

其次,玉器方面。辽西地区的玉器工艺在距今八九千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臻成熟,但在红山文化一期阶段,玉器仅见于红山文化分布区中偏于北方的西拉木伦河以北,在巴林右旗洪格力图^⑪、翁牛特旗海金山^⑫和林西县柳树林^⑬等遗址都有发现。玉器种类与加工工艺均源自兴隆洼文化传统,主要器形为玉玦、玉匕和玉管;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第二期玉器与同时期西拉木伦河以北由兴隆洼文化延续下来的传统玉器器类或造型明显不同,为全新的斜口筒形玉器和玉环(镯)^⑭,而西拉木伦河以北红山文化二期仍流行玦匕类^⑮(图4)。尽管今天还不能完全确定斜口筒形玉器和玉环(镯)造型的准确来源和路径,但鉴于长江流域的凌家滩文化具有更可靠的斜口筒形玉器造型生成或演化的证据,黄河中游仰韶系统的文化存在更古老的环(镯)使用传统,同时在距今约6000年前红山文化周边是后冈一期文化以及该文化向西迁徙的移民创造的石虎山文化和鲁家坡一期文化,凌家滩文化和仰韶系统的文化因素进入辽西也必须通过后冈一期文化系统的传递,所以我们认为,红山文化一、二期玉器与陶器一样,在西拉木伦河南北存在着土著和燕南文化

系统两个不同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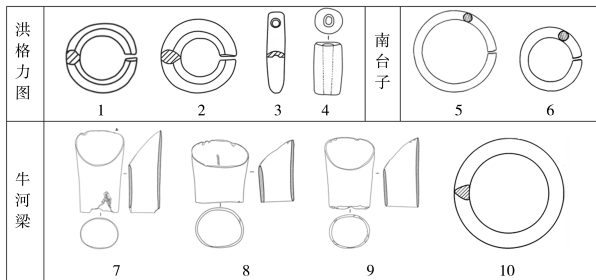


图4 红山文化第一、二期玉器

注:1.洪格力图原报告图三3 2.洪格力图原报告图三5
3.洪格力图原报告图二10 4.洪格力图原报告图二6 5.南台子 M7:3 6.南台子 M7:2 7.牛河梁 N2Z4M8:1 8.牛河梁 N2Z4M16:1 9.牛河梁 N2Z4M9:1 10.牛河梁 N5Z1M7:1

最后,祭祀传统方面。在建平马鞍桥山遗址红山村附近发现了一座由人工堆积而成的大型土台遗迹,平面近圆角长方形,分布范围近1.2万平方米。土台垫土堆积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为黑褐色土,第二层为黄褐色土,第三层为白黄色土,其中黑褐色土堆积只分布于土台的南部,面积约5000平方米。在土台北半部的东、西、北三面边缘保留有斜坡状土台边棱,现存高度约1.5米。在土台堆积上发现有祭祀坑,第一层堆积发现灰坑29个,第二层堆积发现灰坑1个。灰坑平面多为圆形、椭圆形和长方形等,多数灰坑出土遗物较少,但有数个灰坑内出土单一、完整、可复原的陶器组合,如H47出土筒形罐、彩陶壶、红陶钵和贝壳类器物;H53出土筒形罐、陶壶、陶钵和斜口陶器;H61出土筒形罐、钵和器座,H52、H62、H65出土筒形罐和钵(碗)。

在赵宝沟文化赵宝沟遗址二区的东部,距居住址百米左右的坡地顶部凸起的平台上,发现一处平面呈圆角方形的石块垒砌的平台式建筑,石台南北长18.5米,东西宽17.5米,残高1.3米,平台的边缘见有墙体的迹象,推测平台上原有建筑,平台四面呈坡状,除东面较陡直外,其余三面都较为平缓,如图5所示。石台遗迹建筑于生土之上,石块多竖直垒砌,边缘石块体量较大,数量也多,中心部分除底部用大石块外,上部多用小石块填充。原报告推测其为一处祭祀性建筑,显然这种石砌祭祀建筑传统未被马鞍桥山遗址的红山人继承。

马鞍桥山遗址所见人工堆积的土台,其上

挖坑埋葬祭品形成祭祀遗址的情况在辽西地区土著兴隆洼-赵宝沟系统文化中皆不见,却与燕南北福地遗址祭祀场具有诸多的可比性。北福地遗址位于河北省易县,其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可分三期,第一期为磁山文化,第二期为北福地二期文化(北辛文化),第三期为雪山一期文化。磁山文化与北辛文化与后冈一期文化属于同谱系具有发展演变关系的考古学文化^⑦。北福地遗址磁山文化阶段的居民在村落西侧建有祭祀场。祭祀场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10.8米、南北宽8.4米,总面积90余平方米。其应是直接挖建于生土之上,存深约0.2米,地面比较平整。祭祀场本身的结构由上到下可分3个层次:

第一层为祭祀场覆盖土堆积层,大部分区域厚度在0.2—0.35米,土色为深褐色夹杂灰白色,剖面观察局部地区存有平行层理,较纯净,极少含有陶器残片等遗物。

第二层为祭祀场活动面,活动面中央部位

是略高于附近地面并向周围呈缓坡状下延的深褐土堆积,最厚处达0.4米。周围是较平坦的活动地面,系生土地面平整而成,比较平坦,表面呈深褐色或灰褐色,可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堆积而成,而新鲜的生土面则呈红褐色。活动面上有9处浅坑,平面不太规则,一般为浅圆底。

第三层次是祭祀活动面,西南角有一个长2.52米、宽0.78米、深0.7米,内含大量木炭碎屑的深坑H109,如图6所示。祭祀遗物埋藏有三种形式:中心堆积土的表面或堆积土内、祭祀场活动地面上、活动面上浅坑的填土表面或坑内或坑底。祭器为生活用器或工具、装饰品,包括陶器、石器、玉器等,以分组平面铺排为主,器物之间的叠压现象少见^⑧。可见马鞍桥山遗址和北福地遗址的祭祀场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当属同类,后者有可能是前者祭祀场建筑传统的来源^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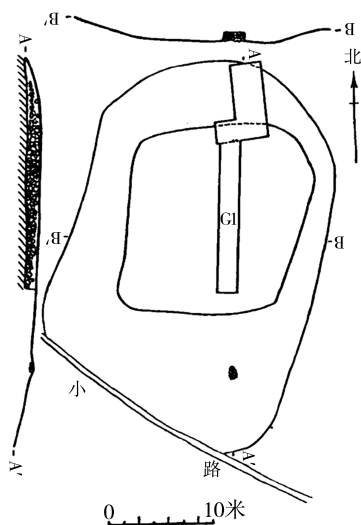


图5 赵宝沟遗址祭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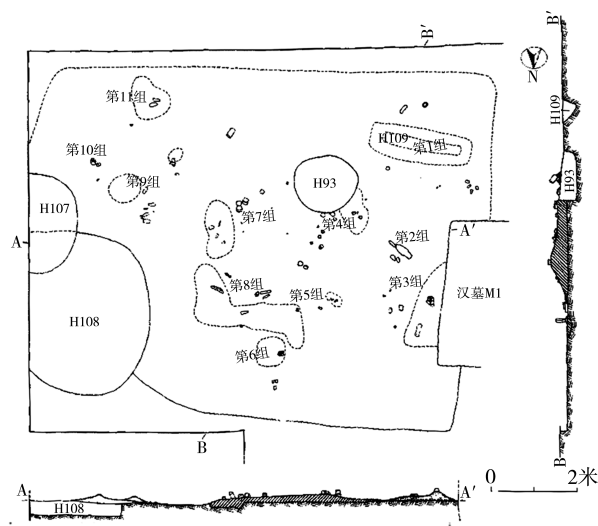


图6 北福地一期祭坛

综上所述,所有已知的差异都显示西拉木伦河南北的红山文化一、二期阶段稳定地存在着分别源自辽西土著兴隆洼-赵宝沟文化和燕南磁山-北辛-后冈一期文化两支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系统的传统。泥条盘筑和泥圈套接法工艺分别是后冈一期文化系统和辽西土著的兴隆洼-赵宝沟文化系统各自根深蒂固的传统。从分期的角度看,这种工艺上的差异稳定地存在于红山文化的一、二两期,持续了近千年之久

(直到第三期古国出现才看到工艺上的融合),将其作为考古学文化背后的人群差异的标志物可能更合理。

玉器角度更是如此,西拉木伦河以南距今八九千年以来,一直是土著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分布中心,如将红山文化看作辽西土著居民学习了后冈一期文化先进因素形成的考古学文化,那么进入红山文化之后,在注入了新生命力的同时,在其中心区的土著居民却放弃

了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代表最高生产力水平的玉器工艺及相关思想观念,而流落到边疆地区,而后这一区域发展起来的却又是全然不同的玉器造型和思想体系,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祭祀建筑也表现出同样的指向。故而我们认为红山文化是由辽西土著与来自燕南的后冈一期文化移民共同创造的考古学文化^⑩。考古材料告诉我们,此后两个不同文化谱系的居民隔西拉木伦河共生,各自以血缘为纽带生活于自己的氏族部落中,一方面使各自深层的文化传统得以长久保留,另一方面相邻地区的生活、交换或通婚,造成了彼此交流交往和不断认同的条件,到红山文化第三期逐渐形成了自外在的显性标识到信仰、价值观的相同或相近,最终在特殊情况下为实现在血缘组织之上形成更高的公共权力创造了条件^⑪。从红山文化可能分别属于两个人群集团的方、圆形积石冢出土的情况看,直到进入古国时代,跨血缘之上的古国公权力之下,被统治的基本社会组织仍旧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并已经形成了一人为尊的若干族群和部落联盟。

之所以采用人类学中“族群”的概念,是因为族群是在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以及体质特征的一种群体。人类学文献是这样界定族群的:(1)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具有较强的自我持续性;(2)共享在各种文化形式下的外显统一性中所实现的基本文化价值观;(3)建立一个交流和沟通的领域;(4)拥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同的成员资格,以建立与其他同一层级下的类别相区分的范畴^⑫。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具有谱系关系的考古学文化相一致。根据苏秉琦等人的区系类型理论,考古学中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而各谱系考古学文化背后的人们又是以血缘为纽带,坚固地维系在氏族、部落之中的^⑬。所以我们将中国北方距今七八千年前即已形成的燕山以北、医巫闾山以西、七老图山以东的辽河上游一带使用筒形陶罐的居民,燕山以南黄河下游地区使用陶盂和陶支座组合或陶鼎的居民和黄河中游地区使用小口小底或尖底瓶为特征的居民视为三个不同的族群集团^⑭。在这个意义上,红山文化自形成起就包含了两个不同的血缘族群。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建平马鞍桥山^⑮和朝阳小东山^⑯这两个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房址并存的遗址。其中马鞍桥山遗址考古材料未完整发表,但从发掘者的相关文章中可知,在室内活动面上放置有人骨的房址中,陶器均为黑陶,表面刻画几何纹图案,陶器组合为筒形罐、圈足钵和敛口深腹瓮等,遗址中同时并存有出土红彩彩陶的房址^⑰。而小东山遗址由于发表了完整的房址及陶器信息,我们得以更全面地了解诸房址的文化性质。该遗址东侧一排分布着方形房址,房址内出土有筒形罐、尊形罐、盂、瓮、高足钵、直腹平底碗、弧腹平底碗等,为赵宝沟文化陶器器物组合,唯陶瓮为以往赵宝沟文化所不见,却在其西侧属于早期红山文化房址的器物群中可见相似器型。这种情况说明两种房址文化性质不同,但此处之赵宝沟文化房址年代已进入红山文化一期阶段。上述两遗址,我们认为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同一聚落中同时存在着年代基本相同的两种文化属性的房址,如视作并存,则不符合社会组织以血缘为纽带的史前聚落的存在形式;如视作不共存,则需解释这种并出现象出现的原因。我们利用已知的信息进行如下分析,首先赵宝沟文化北起西拉木伦河流域,南越燕山到达滦河流域,西起大兴安岭,东抵医巫闾山和渤海西岸,以大凌河、小凌河、老哈河、教来河流域,亦即以赵宝沟文化分布的东部地区为中心;其次,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房址共存的遗址,都处于已知赵宝沟文化的最后一期、红山文化一期早段;最后,红山文化一期晚段,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出现了以白音长汗四期早段为代表、传承了赵宝沟文化泥圈盘筑制陶工艺、玉器制作传统的红山文化,同时在西拉木伦河以南是以西水泉F7为代表,传承了后冈一期文化泥条盘筑制陶工艺、土筑祭坛传统的红山文化。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后冈一期文化移民进入辽西形成最早的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存在一个渐次北移的过程,文化面貌也从进入早期红山文化阶段的个别后冈一期文化泥质陶器器型为赵宝沟文化吸收,到与西拉木伦河以南的红山文化一样具备了“三石”“三陶”的基本特征。回过头来看,两个文化房址的共存应该是

一种短时间内聚落的平替现象,只是其时间差太短暂而已。赵宝沟文化房址室内遗物凌乱堆置的情况,也符合居民仓促出走的情形。

第二,马鞍桥山遗址赵宝沟文化房址内的人骨,无独立墓坑,人骨属捡骨散乱堆放,与该文化前身兴隆洼文化的居室葬有着本质区别。如F1活动面上和灶址内放置了两具人骨,人骨均为二次捡骨,叠放在一起,并和完整陶器叠压着;在F5活动面上发现的是一个头骨和几段散乱的肢骨。这些居室内的人骨都应属于非正常埋葬。

综合上述两点,我们推测这两处遗址正是向北移民的后冈一期文化居民对当地土著赵宝沟文化居民实施驱赶式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赵宝沟文化向红山文化的演变,更不是合二为一的族群融合,直至两个文化的居民在西拉木伦河两岸形成平衡共生的格局。

(二) 仰韶文化因素与仰韶族群

红山文化第二、三期中有一批具有半坡文化特征的因素或源自半坡文化元素的变体始终与土著文化因素相伴而出,且越到晚期表现越充分。目前已知的红山文化周边地区并未见到过单纯的半坡文化遗址,但西阴文化崛起后,在关中西部、陇东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尤其在内蒙古中南部这一通向辽西的通道上,都发现了既有半坡文化特征又包含西阴文化因素的遗址^⑧。这种不同文化因素混合存在的现象,应该是对红山文化第二、三期文化面貌形成的最恰当的解释。考古材料显示的半坡文化与西阴文化遗存的共存,背后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原生地的半坡文化受新崛起的西阴文化的影响,二是进入新地区的西阴文化受当地原有半坡文化的影响,三是内蒙古中南部这个非半坡文化原生地的区域受西阴文化挤压迁徙而至的夹带了部分西阴文化新因素的半坡后裔文化(白泥窑子文化)的影响。最后一种可能性应该更大,因为这里有早于此类文化的与后冈一期文化更为接近的鲁家坡一期文化^⑨。与有着这样一个文化背景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为邻,红山文化二、三期携带的半坡文化因素、西阴文化因素就能够得到顺理成章的解释,也因为其碰撞的主体是后半坡文化而非西阴文化本身,所以红山文化二、

三期彩陶始终表现为以鱼纹、散化鱼纹、图案化鱼尾纹演变而成的各种几何图案为主体。

至红山文化三期,由陶器体现出的文化面貌较之前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变化,即具有半坡文化遗风的器物再一次大量出现,此现象应理解为在西阴文化居民强势驱赶下节节后退的后半坡文化居民在辽西地区找到了一个使之能够重新与西阴文化抗衡的落脚点,抑或是红山文化原住民与后半坡文化居民碰撞融合的结果,还有待对牛河梁乃至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更多的考古资料的进一步研究。

至于西阴文化因素在红山文化二、三期中也有所存在,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文化交往,但显然是后半坡的白泥窑子文化的影响更为强烈,而当时在中国北方文化中最强势的西阴文化,影响却没有那么大,当时风靡整个北方的西阴文化花形彩陶在红山文化中几近消失,可见西阴文化与红山文化的交往在燕山以南仍然是不甚顺畅的。

三、红山文化族群辨识的意义

从上文可知,红山文化自形成起就具有族群多元的特征,其文明化进程同时也是族群进一步复杂化和交融融合的过程。红山文化族群多元性的辨识对于红山文化与红山文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 红山古国文明性质的认定

自20世纪80年代牛河梁遗址发现以来,红山文化是否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课题。由于缺少青铜器、文字、城市等传统文明起源的三大标志性要素,且尚未发现存在中心聚落(即都邑)和发达的农业的确切证据,其文明属性长期未能获得广泛认可。尽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研究成果宣布红山文化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但似乎又回到了近四十年前就提出的红山文化中存在大规模的坛庙冢建筑群,规模巨大而有着严密规划的工程非普通氏族社会能够完成,必定要有一个高于血缘氏族的国家机构来组织和管理这个所谓的证据上面了,或者更多的论证趋向于在中国古文献“文采光明”的“文明”意义下,通

过解释红山文化各种礼仪制度,去理解和诠释其文明特质和意义。

究竟如何认识红山古国文明的性质呢?“文明”一词,中国古已有之。《易经·贲卦》有“文明以止,人文也”^{[1]75},《易传·文言传·乾文言》讲“见龙在田,天下文明”^{[1]29},《尚书·舜典》言“浚哲文明,温恭允塞”^{[2]231}。孔颖达对上文的注疏分别为“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1]75}，“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1]29}，“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2]264}。简言之,“文明”就是文采光明的意思,是对因着文采使人类文化更精致更张扬的褒赞,显然与我们今天探源的文明不是一个概念。

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赋予“文明”以社会形态的意义,他提出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文明成为人类社会经过蒙昧社会、野蛮社会之后的一个社会阶段,从而如何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成为一个问题。摩尔根把发明文字与有文字记载作为判断文明社会的标志,他还认为野蛮阶段晚期的社会组织是部落联盟,而文明阶段的社会组织是国家^⑧。摩尔根之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又不断地对摩尔根的文明标志进行修正。我国学者夏鼐于1985年提出“城市、文字和冶炼金属”三种文明的标志性要素^⑨。202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⑩。但是,似乎所有的标准或方案都无法用具体的物化或文化形式的标准囊括在生态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上具有特殊性的世界各地的文明的起源方式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地文明社会演进格局均具有多样性。在此意义上,与文明起源相伴而生的国家,在判断文明的起点,包括红山古国文明的意义上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是血缘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或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出现了超越血缘组织的跨地域的公共权力”^[3]。在红山文化多族群的视角下,其形成之初就具有不同族群的性质,但其时族群

尚各自生活在以自己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里,互不统领。到了红山文化二、三期之交,在黄河中游的半坡系和西阴系新石器文化向东北的挤压下,新的文化因素和人群的进入,对原本红山文化中两个族群间经过千年磨合已然形成相对稳定的资源和土地的占有形式提出了重新分配的要求。此时出现了牛河梁遗址所表述的、有着明确整体规划的、由不同族群的积石冢和他们共同祭祀的共祖——女神的庙宇构成的超越了血缘族群的祭祀中心,出现了超越不同族群的礼制,出现了属于不同阶段、不同族群的最高等级的积石冢轮流占据公权力顶端的现象,这不正是恩格斯界定的国家公共权力存在的实证吗?尽管在这种公共权力之下,不同的族群依然被血缘关系维系在各自的血缘组织之中。文明要素或标志是为了证明进入了文明社会,而超越血缘组织的跨地域的公共权力的存在已然被证实,还要用某些要素的缺失去质疑它吗?

(二)红山文明化进程途径与模式的提出

如前文所述,从红山文化的形成至红山文明的形成,是以距今6500—5200年间中国北方三大族群集团在辽西地区碰撞、互动为背景的。在距今6500年左右,随着农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加,属于黄河下游素面陶集团的后冈一期文化迅速向外扩张,其中越过燕山进入辽西的一支,与当地土著赵宝沟文化居民从碰撞、冲突到共生,双方的物质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具有双方相似因素的器物群,以至于考古学上将他们的遗存以“三石”“三陶”为共性统称为红山文化。隔河而居的两个文化谱系完全不同的人群,虽然他们之间在使用的器物群等物质方面已经逐渐开始趋同,但是表现在玉器、祭祀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性仍然不小,且他们依然隔着西拉木伦河按照各自的血缘组织独立发展。

到了大约6000年前,黄河中游的文化格局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半坡系文化的扩张引发了今天内蒙古地区鲁家坡一期文化的形成,以及后续半坡移民直接创造了白泥窑子文化,他们的北上带来了黄河中游文化因素,与此同时,构成红山文化的两支古老族群间的融合也已经从物质文化的认同发展到精神领域信仰与宗教

形式的认同比如龙的信仰、女神崇拜已经成为二者一致的基本价值观。在对待周边新的文化冲击中,他们共同吸取先进族群的优秀文化与技术,使自身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同时促使宗教礼仪也日臻复杂和成熟。

再后,西阴文化向北发展最终在晋北和冀北站住了脚,被西阴文化居民一路驱赶的晋中北和内蒙古中南部的后冈人后裔和白泥窑子文化居民节节败退,他们可去之处只有辽西,红山文化区域内的族群进一步复杂化,这就是距今5700年左右红山古国形成的历史背景。如何应对资源需重新分配的现实,红山文化内部各族群从单纯物质层面的认同,到精神、信仰上的渐趋一致,为超越血缘族群的公权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文化碰撞中物质文化的发展和技艺的提高等也为宗教的进一步神圣化和仪式化以及宗教权力的进一步垄断创造了条件,红山文化在血缘社会基础上创制国家制度的条件成熟了。于是红山人选择认同优先,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了超越单一族群血缘社会的古国权力的诞生。这正是晚期红山文化在农业欠发达,聚落缺乏分化,财富集中不明显,军事权力不集中,不能通过生产发展、财富积累、社会分化形成控制整个区域的权力的情况下,得以出现国家权力的原因。

在族群多元性视域下对西拉木伦河两岸红山文化的观察,以及不同文化因素进入辽西地区的进程与碰撞融合,使我们看到红山文化由族群多元到文化一体再到古国体制的创制与形成的文明化进程。在文化融合过程中,通过玉礼器的形成、宗教仪式的复杂化和精神共祖——女神的创造,构建古国共同体成员共同的集体记忆,以达到通过宗教权力实现对世俗世界的统治,最终实现“绝地天通”国家公共权力体系的红山文明模式,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注释

①王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1日。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2003)》,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③井中伟、赵俊杰:《赤峰市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2010》,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侯静波、陈国庆:《浅析外来文化对魏家窝铺红山文化环境聚落的渗透与影响》,《边疆考古研究》第29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成璟瑯、塔拉、曹建恩等:《内蒙古赤峰魏家窝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认识》,《文物》2014年第11期;段天璟、成璟瑯、曹建恩:《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研究的重要发现——2010年赤峰魏家窝铺遗址考古发掘的收获与启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④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元宝山哈喇海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年第1期。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张星德:《后冈期红山文化陶器分期及相关问题》,载《边疆考古研究》第18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9—194页。⑧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⑩张星德:《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组”陶器的辨识及其意义》,《考古》2018年第11期。⑪苏布德:《洪格力图红山文化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2期。⑫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内蒙古翁牛特旗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1期。⑬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林西县柳树林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15年第1期。⑭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⑮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发掘简报》,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第87—95页;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左旗友好村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草原文物》2014年第1期。⑯张忠培、乔梁:《后冈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⑰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⑱李敖:《红山文化族群多元性考察及其意义》,载《边疆考古研究》第36辑,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24—337页。⑲张星德:《后冈期红山文化再考察》,《文物》2015年第5期。⑳张星德、张瑞强:《文化认同——红山文化文明化进程的主旋律》,载《考古学研究(十六)》,文物出版社2024年版,第354—366页。㉑[挪威]弗雷德里克·巴

斯主编、李丽琴译、马成俊校：《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3页。
 ②③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②④张星德、田建文：《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的互动与红山文明的形成》，《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
 ②⑤樊圣英、刘超、李波：《辽宁建平县马鞍桥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认识》，《北方文物》2023年第4期。
 ②⑦《2020年度马鞍桥山遗址发掘情况汇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众号，http://kaogu.cssn.cn/zwb/xccz/202102/t20210219_5312397.shtml。
 ②⑧许永杰：《再审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年代关系》，《考古》2015年第3期；余西云：《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

所：《准格尔旗鲁家坡遗址》，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36页。
 ③⑩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③⑪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③⑫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参考文献

- [1]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
-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2.

Cultural Accommodation and Ethnic Integration During th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Hongshan Culture

Zhang Xingde and Lu Zhiping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factors reflects the diverse natures and forms of interaction among the people behind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Researches on known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indicate that the Hongshan culture along the Xilamulun River during the period from 6,500 to 5,700 years ago was the product of the collision and mutu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descendants of the Zhaobaogou culture and the immigrants from the Hougang Phase I culture.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as a gradual convergence from the material cultural level represented by the “sanshi” and “santao” as explicit symbols or signs, to the recognition of faith and religious forms represented by jade culture, dragon worship, and goddess wo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inted pottery, the Banpo of the Yangshao system and its descendants should also have been important participan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d Mountain civilization. Eventually, when new ethnic groups further integrated into western Liaoning, the resident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Hongshan culture were able to prioritize shared recognition. Despite unrelated bloodline organizations, they established a public power to coordinate and manag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forming an ancient stat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Hongshan cultur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cultural accommodation; ethnic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启 轩]